



香港創新醫療學會
SOCIETY FOR
INNOVATIVE
HEALTHCARE
HONG KONG



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醫療發展中的作用*

高永文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出，「塑造健康灣區，加強醫療合作」是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中擁有一國之利、兩制之便的特殊優勢，可以為大灣區其他城市提供「超級聯繫人」角色的功能。我認為，香港可以為中山在醫療服務和醫藥研發方面，提供特殊的支持作用。

在醫療服務方面，隨著內地社會發展，人民對醫療有了更高質和更大量的需求。新醫改實施至今，各地政府針對當地的特點和現實情況，不斷推進不同的改革措施。香港經驗能夠為內地醫療改革多元化路徑的探索，提供一種新的參考，而粵港澳大灣區正是兩地合作的重要試點。

香港實行公私營雙軌醫療服務模式，為香港市民提供全面的醫療保障，滿足不同層面的醫療需求，高水平的醫療服務在國際範圍內享有較高的聲譽。香港醫療服務的優勢體現在醫療體系的設計：在公立部份，香港的醫療管理制度值得借鑒；而在私營部份，可以積極鼓勵和進一步開放香港高端的醫療服務進入中山的市場。

首先，香港公立醫療部門的醫療融資模式和現代醫院治理模式，確保了高度的公益性，使其不受資源所困，也沒有資本逐利性的困擾。在宏觀層面，香港公立醫療體系設立了具有權責分明的問責制度，可以確保公共資源使用的專業性；在微觀治理層面，可以從薪酬制度、專業醫療行政管理制度、人才培訓體等，引導醫療人員行為，確保醫療服務公益性以及保障服務效率。

第二，香港醫療體系實行分級診療，即「先全科、後專科」的概念，這也是內地醫改的目標之一。我觀察到，目前不少港資醫療機構向內地發展，它們有成熟的辦醫、管醫和行醫的經驗，包括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對內地公立醫院的管理模式進行了改革創新，提供港式基層醫療體驗，並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過，內地民眾習慣依賴傳統公立醫療，對全科診療的認知度不高，對這個醫療流程感到陌生，是現時基層醫療發展的一個障礙。

第三，為補充和分擔公立醫療服務的壓力，以及擴大整個社會的醫療資源給，香港積極鼓勵社會力量的參與。香港的私營醫療服務在整個社會發展中，有明確的定位、角色和分工，為民眾提供不同的醫療體驗。同時，香港特區政府重視私營部門對公立醫療的互補作用，對其採取多方面的管理方式：一是給予它們市場發展空間，使它們不因政府對公營醫療體系的支持而受到抑制；二是按其專業和機構功能規管，不同的參與主體和醫療活動，受不同的法律規管；三是加強政策引導，改革醫療保險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推動自願醫保計劃和長者醫療券，讓私營醫療機構發揮更大的作用。

近年，內地民營醫療發展很快，但其市場認可度和質量的保證，與公立醫療機構比較，仍有一定的差距。我注意到港資商業醫療機構正向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城市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內地民營醫療的多元化。但目前由於內地和香港兩地對醫療和藥物的監管體制同，港資機構進入內地市場仍面對一定的挑戰，包括營商環境、商業模式、以及管理模式的差異。而且，香港醫療與內地醫療的差異性很大程度體現於藥品使用上，在內地辦醫的香港醫療產業參與者尚無法直接使用已在香港上市但未於國家藥監局註冊的藥品。

最近，一項具有突破性的政策出台，香港食物及衛生局正與內地有關當局商討具體安排，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為試點，容許大灣區內地城市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用已在香港註冊藥物和常用醫療儀器。此創新政策為港式醫療服務提供者和使用者提供了便利，也有助提升大灣區的醫療衛生水平。

基於大灣區整體的醫療發展的需要，下一步，我建議中山市可以在特定區域或指定醫療機構，對醫療要素跨境合作提出更多先行先試的舉措，例如放寬准入規則、醫生的資質認可、醫生執業、藥物的使用及醫療數據互通等，通過先行一步，實現中山和香港優勢互補、共創優質生活圈、促進民生福祉。在醫藥研發方面，香港的醫藥產業發展在國際化標準、平台孵化、科研人才、金融資本方面均有出色的優勢，初步形成了蓬勃的生物科技生態圈。

(一)，香港的生物科技臨床研究與世界標準接軌，香港的大學是醫學科研與臨床試驗的基地，近年更屢獲世界頂尖醫學期刊推崇。香港更是全球首個地方，臨床測試數據可同時獲美國 FDA、歐洲 EMA 和國家 CFDA 等藥物管理局認可作藥物註冊用途，吸引多間跨國藥廠選擇與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院合作。因此，粵港合作研發生物醫藥的機制，可以使大灣區成為內地和國際醫藥上市標準之間的橋樑。

(二)，特區政府也十分重視香港生物醫藥科技的發展，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重點支持生物醫藥科技的項目共 460 多個。另外，特區政府提供資金讓香

港科學園建設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已有 150 多間生物科技公 司進駐。同時，去年科技園的生物醫藥科技培育計劃有 6 間培育公司畢業，創歷屆新高。科學園顯然是理想的孵化平台，提供各種各樣的設備和高端的儀器、計劃和配套，讓生物科技初創公司取得相關數據，例如 生物醫藥科技支援中心 (BSC)，就提供了 80 多樣高端技術的儀器，初創 公司就可以節省投資在儀器上的成本。

我了解到中山與香港大學、廣東藥科大學共建生物醫藥創新中心，建設技術轉移中心和生物醫藥專業孵化器。這類型的平台對接合作，不僅在信息交流層面溝通，也將在操作層面取得進步，加速生物醫藥研發成果的技術轉化和產業化。期待日後有更多粵港生物醫藥科技創新平台的合作，為兩地創造更多交流合作的機會。

(三)，配合尖端的生物醫學研發的人才方面，香港擁有多位著名的世界級專家，同時著重培養更多的人才，例如香港科技大學開辦生物科技及商學理學士課程、香港城市大學開辦生物醫學工程理學碩士課程、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也相繼成立生物醫學工程學系。這將進一步豐富香港生物醫藥研發的土壤，充實生物科技人才庫。目前香港科研人才跨境仍有不便之處，如在個人所得稅等方面，而海外研究人員的簽證和執業上還存在不少障礙。隨著大灣區的建設日趨完善，相信人員跨境流動將逐漸順暢。

(四)，在進出口物流和關稅方面，香港亦擔當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為醫藥出入口、貿易及物流提供專業的供應鏈管理、保險及融資服務， 形成醫藥貿易樞紐的重要一環，促進大灣區醫藥產業的國際化。另外， 醫藥研究經常用到多種研發材料，對進口科研設備、生物試劑等有很大 的需求。據瞭解，現時 6 家香港高校在深圳設立的研究機構已可以享受減免稅款，並通過深圳海關的「一站式」監管，對血液製品、人體細胞等高風險特殊物品安排專人跟蹤指導，實現了跨境使用生物實驗樣本。可見，粵港澳大灣區的醫藥研究發展可以通過從香港進口生物樣本提升效率。未來仍需要探討擴大試點、簡化免稅流程和相關手續等。

(五)，生物醫藥技術是既尖端且創新的，因此關於其專利、商業秘密、技術內容、機密和專有資訊等，必須加以法律的保障，否則將嚴重影響生物醫藥企業的競爭能力、成功機率及日後的收益分配等問題。這方面，香港有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和法律，可以保護生物醫藥的研究成果，作為它們可靠的後盾。另一個生物醫藥生態鏈的重要組成，是企業融資和其他金融服務。 生物醫藥是一個高風險行業，企業募資有一定的難。中山市引入了中 國十大天使投資機構和出台健康產業股權投資基金等，作為對醫藥產業 前期融資的支撐。在成熟期融資和後期投資退出方面，醫藥項目需要貿易進出口及融資、結算匯兌、收購、

財務集中管理以及跨國經營等相關的金融服務。

香港的金融資本市場活躍，加上香港交易所在 2018 年中已修改上市規則，允許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業在香港主板上市集資。該措施為較成熟的生物科技公司 and 投資者提供了方便的募資和投資退出的渠道，完善了企業全時期的金融需要。數據顯示，單在去年就有 14 間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上市，共融資 400 億港元。

去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令醫藥需求升，大量資本湧入生物醫藥行業，令香港在 2020 年成為亞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集資中心，證明了生物醫藥的前景。粵港兩地優勢疊加，可以建設更完善的募資鏈，支持大量成本高昂的研發工作，促進產業良性發展。香港本地生物科技生態圈已漸見雛形，也在逐步擴張。以上所述的香港優勢，加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動力，將有助成本效益和市場開發，粵港醫藥研發領域的增長速度必更理想。

最後，新冠疫情進入了新常態時期，兩地應如何實行安全的跨境防疫措施，將成為另一個重要的課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有賴跨境要素的流動，我認為防疫措施需要更張弛有度。包括跨境遊、商務、貨運等，就各行業訂立行業相關的、分級的、基於兩地同意的跨境防疫守則，有效執行可以預防和及早發現異常情況。此外，可以積極研究兩地醫療病歷、電子健康碼跨境互通的可能性，有序實施兩地信息流動。

(*香港創新醫療學會首席顧問、香港醫務行政學院榮譽院士、前食物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醫生於 2021 年 3 月 28 日「中山香港健康醫藥產業論壇」之主題演講。)